



经济视野扩张、种群视野缺失与 叙事政治阐释的盲视

——詹姆逊叙事政治阐释学主符码评析之七

张开焱

摘要：詹姆逊叙事政治阐释学的主符码是“总体性历史”，而“总体性历史”的终极统摄性力量是“生产方式”。在詹姆逊的理论模式中，生产方式覆盖了从社会文化生产到政治体制生产到经济生产的所有层面。但从他大量的论文论著中可以看出，他特别强调经济生产方式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其理论还是潜在地存在着经济决定论的痕迹，但基于经济生产方式的分析在詹姆逊手上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解释力量。詹姆逊社会结构模式和生产理论最大的缺陷，就是完全无视种群生产方式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因此，其社会结构理论存在明显片面性。由于种群生产视野的缺失，导致他叙事政治阐释理论和实践中对种群生产与叙事活动内在关系的完全盲视，这是一个严重的缺憾。

关键词：叙事政治阐释；生产方式；种群生产；詹姆逊

詹姆逊叙事政治阐释学的主符码之一是“总体性历史”，而“总体性历史”的终极统摄性力量是“生产方式”。在他那里，对叙事问题的政治阐释与历史阐释是同一回事。而他的历史观又是建立在黑格尔逻辑主义与卢卡契式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相结合基础之上的，历史具有总体性是他关于历史最重要的一个认知。而历史的总体性由什么来保证呢？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被认为是“经济基础”（如那个经典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结构模式）或“阶级斗争”（如“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詹姆逊则认为不是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或者“阶级斗争”，而是“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一文中，他对此进行了明确的指认^①；在《单一的现代性》中，他再次指认“马克思主义的‘主符码’是以生产方式的序列为基础，以具有特殊地位的资本主义为认识立场”^②。在此基础上，他吸纳阿尔都塞结构历史观，将生产方式作为统摄从文化生产到经济生产的所有社会结构层面的总体性范畴，建构了自己的社会结构模式。

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主符码和社会结构模式的调整，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资源以使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获得发言权的努力，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在充分肯定这个努力的前提下，也要看到詹姆逊这个阐释主符码存在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经济视野的扩张与种群视野的缺失。鉴于此，本文拟集中对其“生产方

①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载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17~51 页。

② 《詹姆逊文集》第 4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97 页。

式”符码构成中经济基因的扩张、种群视角的缺失及由此导致的叙事政治阐释盲视进行清理和检讨。

一、詹姆逊理论中经济视野的极度扩张

本文的检讨从詹姆逊吸纳阿尔都塞结构历史观建构的社会结构模式^①开始(如图 1):

在后现代语境中,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主符码和社会结构模式调整的用意,是为了避免被许多非马学者诟病的那个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局限。他多次明确表示,自己不是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问题是,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生产方式”主要是与经济活动方式连在一起的概念,天然携带“经济生产”的基因。现在,詹姆逊将这个概念从经济基础范畴中提出来,作为覆盖整个社会结构的总体性概念,如何去除其天然携带的“经济决定论”基因,是他面临的一个问题。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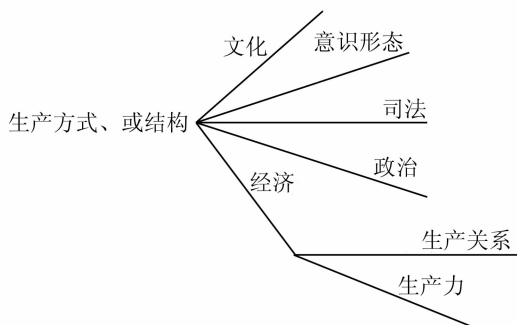


图 1 詹姆逊社会结构模式图

除了将“生产方式”特别提出来放在左边作为统摄性因素外,右边那个社会分层结构图其实还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典型的经济决定论式的社会结构模式图,这也许暗示,詹姆逊潜意识层次的关于社会结构的图式其实还是右边这个分层模式。

事实上,詹姆逊除了在《政治无意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②等著作中特别强调“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的经济因素外,在其它论文论著中都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在《六十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一书中,他纵论 20 世纪 60 年代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叛性革命热潮时,最后就将其原因归结到全球性的经济根源中去。他说,从 80 年代的眼光看这些政治运动,“也许最好的办法是将它看作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或体制舞台向另一个转型过渡下的上层建筑的运动和游戏”^③。他在《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一文中,将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别确认为以“金钱和市场体系”这种“物化的力量”为基础的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对应性产物:“我的观点是,如果说现实主义形势是某种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势,而现代主义的形势是一种超越了民族市场的界限,扩展了的世界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的形势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形势就必须被看作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老的帝国主义的、跨国资本主义(amultinational capitalism)的或者说失去了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形势。”^④这种引起争议的描述后面隐藏的理论框架,正是经济基础决定论。

詹姆逊在许多地方都反复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商品交换和阶级斗争是最关键的概念,“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阐释都必须坚持两个老的而且很熟悉的术语:商品生产和阶级斗争”^⑤。他在生产方式诸构成因素中特别强调资本的作用,他说:“资本的概念是公认的总体化或系统概念。”^⑥在《认知的测绘》一文中,他为自己对资本主义三个阶段的总体化认知辩护:

我想尽力指出,资本的三个历史阶段各自生产出它特有的空间,……我想到的这三个空间都在资本扩展中,……至少可以确信的是,资本的概念随着这个社会制度本身的某个统一逻辑的概念而兴起和衰亡。……这两个概念都无法挽回地成了总体化概念。^⑦

①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27 页。

②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③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六十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吴敏译,载张旭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詹明信理论批评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第 394 页。

④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刘象愚译,载张旭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詹明信理论批评文选》,第 286~287 页。

⑤ 《詹姆逊文集》第 1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186 页。

⑥ 《詹姆逊文集》第 1 卷,第 304 页。

⑦ 《詹姆逊文集》第 1 卷,第 296 页。

很明显,以“资本”作为历史的总体性因素和以生产方式作为历史的总体性因素在他那里是内在一致的。他在就《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一书中译本接受张旭东访谈时特别说到,“我并不认为马克思是经济决定论者。但我认为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这样那样要谈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历史的、不可逾越的一个特征”^①。他从经济角度看后现代,最后得出一个令许多人可能大跌眼镜的结论:“在我看来,关于后现代的理论最终是关于经济的理论。”^②在最近一次来中国所做的关于解读《资本论》的演讲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我不妨就简单提出一个看法:今日之世界政治皆与房地产相关。后现代政治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土地掠夺,在地区和全球范围都是如此。……今天的一切都和土地相关。按马克思主义术语说,这一切变化归于土地的商品化和残余的封建制以及农民阶层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农业、农业商业以及农场工人。^③

所有这些都显示,尽管詹姆逊将“生产方式”作为覆盖整个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总体性要素,但实际上,他心目中的“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最主要的所指还是属于经济基础的那些内容。20世纪,在许多西方学者那里,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遭到质疑,他们转而寻找其它影响历史的重要因素。葛兰西找到了市民文化,阿尔都塞找到了多元决定论,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找到了人本主义,齐泽克找到了意识形态,等等,但詹姆逊理论依然保留着对经济因素的特别倚重。

因此,我们要说,尽管詹姆逊努力想避免经济决定论的嫌疑,但实际上经济视野在他的理论中重新获得了极大的扩张。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理论的阐释力量,恰恰相反,在经济因素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力量实现对社会的渗透和扩张的后现代,詹姆逊的理论选择使他获得了超越时人的透视深度和广度。

詹姆逊的叙事政治分析最让人惊讶的地方之一是,被许多西方学者诟病的经济论视角在他那里释放出了巨大的解释能量,呈现出多彩多姿的形态,显示出令人震撼的锐利、透辟、洞见和理论活力,从而经由他手再一次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学术前沿显示出其动人心魄的魅力。笔者分析,他的思想获得这样效果的原因有二:一是经典唯物主义那个带有经济决定论色彩的理论体系,在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和文学艺术现实的时候,显示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的解释力量。资本主义发展到詹姆逊所说的晚期阶段,经济与资本对人类所有领域全面的渗透和控摄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显现。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视角获得了超出以往所有历史阶段的有效度,这意味着,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并未丧失其有效性。二是与他自己开阔的理论视野相关。詹姆逊是迄今为止理论视野最为开阔的少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这使他能在各种互相对立的理论系统中取长补短,构建自己马克思主义阐释体系。他优游自如地行走在古代、近现代、后现代西方各种思想文化流派中,得心应手地借用这些思想成果和方法作为自己历史分析的阶段性工具,在令人眼花缭乱、富有弹性和辩证性的征引、论辩、剖析中,最终带领读者登上他历史分析的顶峰。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尽管詹姆逊是后现代最强调经济、商品、资本、生产方式巨大作用的理论家,但很少看到人们指责他是一个过时落伍的经济决定论者。可以说,在后现代,他是将经济论视角的阐释力量发挥到极致并获得巨大影响的极少学者之一。

二、詹姆逊叙事政治学中种群视角的缺失

尽管如此,詹姆逊理论体系仍存一个缺失,这影响到他的理论获得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大的解释力量。在他的解释体系中,种群生产方式被完全无视,种群视野完全缺失。

在如图1所示的詹姆逊社会结构模式中,处于基础性地位的经济活动诸要素都被开列了出来,但种

①张旭东:《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詹明信就本文集出版接受采访录(代序)》,载张旭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第17页。

②张旭东:《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詹明信就本文集出版接受采访录(代序)》,载张旭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第17~18页。

③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资本论〉新解》,朱羽、蒋晖译,载《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1期。

群生产这个同样重要的要素,却完全被无视,这是令人遗憾的。詹姆逊借用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他们思想中期提出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那个社会结构模型,但事实上到了马、恩晚年,他们对人类学成果有更多了解后,对这个模型的缺陷是有强烈意识并进行了重大修补的。这集中体现在恩格斯晚年撰写的重要论文《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在这篇论文的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了如下最终表述:“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①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比他们中期那个表述更为全面和有解释力。但很遗憾的是,这个最终表述一直没有受到中西马学的重视,詹姆逊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都无视这个最终表述中的种群生产(即“人自身的生产”)的重要性,这导致了他社会结构模式和历史理论本身的残缺。

种群生产既是人类历史(政治)活动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构成,还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终极目的(作为种群的人类自身的保存、繁衍、延续、发展、进步和进化,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也是最高伦理原则),就人类而言,这应该是最大、最根本的政治目标。人自身的种群生产活动方式是历史地发展和改变的,从原始的群婚制到一夫多妻制或者一妻多夫制,到对偶婚制进而到一夫一妻制,从原始的普鲁那亚大家庭到古代阶级社会的三世、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到近现代“儿—父—母”为核心的二代小家庭,从原始的血缘婚制到非血缘婚制,等等,都意味着种群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发展和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与经济生产方式相关,但并不简单地是由经济生产引起和决定的。仅就种群生产的基本单位家庭的形式而言,一夫一妻制为主的婚姻模式自从进入阶级社会基本被确立后,历经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多种经济生产方式都被保存下来,这典型地说明种群生产方式与经济生产方式之间没有决定性的同一性关系。同时,从共时角度讲,同一种经济生产方式主导的社会,也可能有多种婚姻制度。种群生产方式有自己独立的发展轨迹和规律,每一时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都在为种群生产提供不同的物质平台,但这个平台不会从根本上决定种群生产的方式和规律。

既然种群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那逻辑上它就必定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

首先,人类以个体生命的存在作为前提。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②。而这个前提正是种群生产提供的,也是种群生产的基础。因此,与个体存在的独特性相关的生命意识、性别意识、个体意识等,都必然产生。

其次,种群生产产生了人类基本社会关系领域。马克思谈到个体生命存在是一切历史存在的第一个前提之后说,人类创造历史的三个前提分别是,使生命存活物质质料的生产,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新的需要以及生命的再生产和由此产生的家庭关系。对于第三点他说,“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的社会关系”^③。人是男人和女人结合而生产的。由于这个基本事实,在人的生产活动中,就产生了与之相关的基本社会关系。物质生产中人们结成的是以实际利益为纽带的各种经济关系,而种群生产中结成的则是以血缘和泛血缘为纽带的情感和伦理关系,如两性关系、家庭关系、家族关系、族团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泛化形式种族、民族等,在此基础之上,也产生了以之为基础的相关欲望、情感与观念,即社会意识。

又其次,种群生产基础之上形成了最早的人类社会制度。恩格斯在《家庭 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考察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体制建立的基础,发现原始社会的政治关系是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9页。

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则是建立在经济关系基础之上的^①。恩格斯对阶级社会的考察是以从古代希腊罗马到近代资本主义欧洲历史为对象的,这个判断对欧洲阶级社会的考察大体有效,而对欧洲之外的绝大多数地域则效度有限。因为,在古代中国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血缘关系一直是社会政治体制建构的基础性力量。在国家政治层面,政权一直按皇族血统世袭;在基层政治层面,聚族而居、宗法主导,一直是几千年中国村社的基本组织原则。在原始社会,人类基本都以血缘关系为社会政治的基础,进入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西社会开始选择了不同的国家组织原则。希腊选择了走出家庭和家族,以孤立的个体为单位组成城邦国家^②;中国则基本是一个村社为基础的国家,一直到近代都延续着以血缘家庭、家族为单位组织国家的原则^③。

再其次,与此相关的是,在社会意识形态即精神文化的构成领域,无论中西方,与种群生产相关的观念、愿望、情感,一直是人类意识形态构成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种群意识和情感一直是建构社会精神文化的核心力量,以基于血缘关系的礼教为核心的儒学在中国大行其道绝非偶然。在西方,进入古代希腊罗马社会后,种群意识和情感在意识形态层面相对弱化,与商业经济和城邦聚落形态相关的个人与公民意识居于重要地位。到近现代,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相关的商业主义、理性主义、消费主义观念更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构成。即使如此,种群意识与感情仍然在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最突出地体现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人本主义、人类主义的观念与感情中。而且,在某些时段和国度,种群观念和感情中某些种族主义情感和观念,还成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如希特勒的“雅利安人种优秀论”、美国长期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所体现的种族歧视意识,欧洲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对犹太民族的歧视意识,等等,都曾经是阶段性主导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感情。这说明即是近现代,种群观念和感情仍是西方社会意识形态最深层的“集体无意识”构成。

最后,与种群生产相关的生活、关系、观念、情感在人类文学艺术活动中有最重要的地位。产生于种群生产的欲望、情感和观念,深刻影响着创作动力、作品构成和社会接受心理。关于这个问题,本人已有三篇论文正面论及,为节省篇幅,于兹不赘,有兴趣者可参看^④。

三、种群生产对叙事活动的影响与詹姆斯叙事政治阐释的盲视

詹姆斯有力地阐释了经济生产方式对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对叙事活动、叙事构成的深刻影响,这十分有价值。但种群生产对人类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叙事活动和叙事文本构成的影响,他却置一词,确是明显的缺陷。本处只就种群生产方式和活动对人类叙事活动的重要性做一个简单的勾勒,以证明詹姆斯叙事政治阐释的盲视所在。

首先,从历史角度考察,人类为什么要有叙事活动,人类叙事活动的动力是什么,这与种群生产相关。原始人类两性之间表达爱慕、媾合、祈望个体、家族、部落昌盛绵延、对自己伟大祖先和英雄的崇拜与怀念的欲望和情感,是叙事活动最强大的动力。直到现代文明人这里,这仍然是叙事活动的深层动力之一,对此精神分析学有最深刻的揭示。詹姆斯并非没有注意到精神分析学的成果,他甚至说20世纪最伟大的精神体系之一就是精神分析学。但他实际上将精神分析学的种群生产根基完全抹杀了,而从自己特定的经济政治角度将其转化和利用。例如在《政治无意识》中,他就是从这个角度阐释巴尔扎克在家庭生活中受到的压抑和潜意识欲望的^⑤。詹姆斯做这种转换潜在的认知是:基于种群生产的这种欲望、感情、潜意识和生活本身,远不具有重大的社会历史价值,只有将其转换为和物质生产相结合的内容才有历史价值,这显然是片面的看法。应该看到,人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是人类自身根本的历史使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012年,第13页。

②可参阅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卷三《城邦》、卷四《革命》,谭立铸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7~328页。

③盛洪:《中国和西方是如何分道扬镳的?》,载《读书》2014年第4期。

④参看张开森:《种群文艺视角的可能空间》,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再探》,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种群论视野中的艺术与审美起源》,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⑤弗里德里克·詹姆斯:《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66~169页。

命,因此,对人类种群生产活动促进、引导、控制、完善或阻挠、敌视、排斥、毁灭等的态度和活动,也是最大和最根本的政治,但詹姆斯理论显然缺乏这个维度。

其次,人类种群生产活动也是人类叙事艺术的核心内容。弗雷泽在《金枝》中对原始神话产生于其中的巫术活动进行的著名研究揭示,原始人巫术仪式最重要的是祈丰与祈生仪式两大类,前者以物质生产为对象,后者以生命活动为对象。而在互渗律和生命一体化观念的支配下,他们会将祈丰仪式生命化,即用生命生产的过程来表现物质生产的过程。因而作为人类各民族最早叙事样式的原始神话,其内容大都和祖宗崇拜、性崇拜、生殖崇拜、生命崇拜等种群生产活动观念、情感相关。而基于种群生产活动的氏族、部落、族团间的交往、冲突、战争和胜败的生活则是古代史诗叙事的核心内容,正如巴赫金所说,史诗叙述的是各民族自己远古伟大祖先的生活,所以“是神圣而不可篡改的”^①。

并非古代神话史诗如此,一直到现当代,基于种群生产的那些社会关系、生活、情感、欲望和哲理,男女、家庭、家族、族群、种族、民族之间的爱恨恩仇,依然是文学艺术叙事活动的主要对象和内容。即使在经济活动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当代,人们打开电视、走进电影院、翻开小说,充斥视觉听觉的主要还是这些生活的叙述。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生活的性质,改变的只是这种生活展开的平台和某些局部内容。如此重要的叙事内容,在詹姆斯的叙事政治学中基本没有获得合适的认识和表达,这是他叙事理论令人遗憾的缺陷。

种群生产还影响着叙事的深层语法。结构主义叙事学提出叙事语法这个概念,指的是深藏众多叙事文本表层故事结构内的共同故事规则,原型批评理论也揭示人类所有叙事文学故事深层,都存在一个万法归一的神话原型结构。人类千千万万叙事作品,从终极角度讲,都在讲述一个“元神话”,一个“元英雄”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或这个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对这个理论我们自然不必完全照搬和接受,但它的启发性和部分合理性是明显的。

所有这些,在詹姆斯的叙事政治学中基本都是缺失的。因为种群视野的缺失,使得詹姆斯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叙事政治分析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应的盲视。例如他在《政治无意识》中分析康拉德的小说《吉姆爷》,说这部小说运用的叙事范式之一就是存在主义叙事范式。他所说的存在主义叙事范式,指的是作品经常表现主人公吉姆对于人与世界的关系、人的存在感、价值感、人的超越性等问题的感受和沉思,其中,吉姆在海港对于大海与陆地之间的存在主义式感悟和沉思是最典型的。詹姆斯说作品的这种存在主义叙事范式是一种典型的“遏制策略”,即通过对大海的存在主义式叙述,遮蔽了大海的历史特征。海作为资本主义殖民活动、商业生产和交换活动场所的历史特征,在这种存在主义叙事策略中被遮蔽了^②。这样说当然有不俗的洞见。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就能发现这一说法的局限:因为这样说意味吉姆对大海的存在主义式感受和沉思是非历史的。设若不是吉姆而是一个毛猿或原始部落民处在吉姆的那个位置,他是否面对大海会有吉姆式的存在主义感受和沉思?这个答案是很明白的。这意味着,人类个体面对自然的吉姆式存在主义感受和沉思,是历史地产生的,它就是历史的产物。只不过这个历史,不只是经济生产意义上的历史,而是包括了它但又超越了它的种群进化的历史。人类个体从群体中析出,以一个独立个体的身份立身于世,在与自然面对的时候去感受、思考和领悟个体或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那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到相当高度的近现代社会才可能大面积具有的。因此,吉姆式的存在主义叙事本身就有深厚的历史内容和历史感,说这种叙事遮蔽了真实的历史,恰恰显示出詹姆斯的历史观存在片面性。存在主义将个体意识做了超历史的永恒化描述,但历史分析的任务是要揭示这种意识产生的历史性,而不是简单地否定。

又如詹姆斯在《政治无意识》中对于吉姆行为和心理中体现的责任、荣誉和尊严的意识进行历史分析时,说这种意识是产生于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对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而言,是一种过时的、有疑问的观念。这也是从基于经济视野的社会阶段分期角度而言的,当然自有其道理。但如果从种群视

①《巴赫金全集·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18页。

②弗里德里克·詹姆斯:《政治无意识》,第196~204页。

野看待人类对于责任、荣誉和尊严的追求，我们将发现另外的东西。所谓责任、荣誉和尊严意识，从马斯洛人本心理学的需求层次理论而言，基本属于个人自尊需求的心理层次。自尊需求是个人从群体析出后历史地产生的需求，它并不简单地对应于基于经济基础分期的封建社会，而是在人类成员成为独立自主个体的阶段必然产生的。众所周知，在欧洲文化史上，最早最强烈地体现独立自主、自尊、荣誉和尊严意识的，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阿喀琉斯。希腊神话史诗中的英雄们大都有阿喀琉斯一样强烈的自尊、责任、荣誉和尊严意识。如果按照社会分期理论，他们是奴隶制时代的英雄。而那以后直到现代，西方文化中那些带有英雄色彩的人物无不具有这种强烈的意识和追求。这恰恰说明，责任、荣誉和尊严意识，远不止是与封建社会对应的一种意识形态素。从种群视野角度看，它是人类个体从群体析出后，历史地产生和确认的一种伦理观念，既不只是产生于封建时代，也不止于封建时代。

这样的例子在詹姆逊的叙事政治分析中可以找到很多。他对巴尔扎克、吉辛等等作家作品叙事政治内容的分析，换了种群生产的角度，都会有看到另外的东西。我们可以说，詹姆逊在突出建基于经济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叙事政治分析的同时，遮蔽了叙事种群政治分析的通道和空间。

综上，詹姆逊叙事政治阐释学的基础性理论框架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获得了极大的膨胀和扩张，这总体上给他的文化和叙事政治阐释带来了极大的洞见。其原因，既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的极大阐释潜力，也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和要素的重要作用确实超过了以往任何社会形态，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这个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验证，所以詹姆逊的理论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的阐释具有相当洞见和阐释力量。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后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终极表述中，特别强调了经济生产之外的种群生产因素的重要性，这一表述远比中期建基于经济决定论基础之上的那个经典历史唯物主义表述更为全面和有效。而种群生产的重要性在詹姆逊的理论中却完全被无视了，这是其理论框架的重大缺陷，这也导致他对叙事问题的政治阐释出现明显的盲视和偏误。解决詹姆逊理论的问题，在逻辑上并不困难，完全可以将他的阐释主符码“生产方式”的视域扩大到包含“种群生产方式”，这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表述。

Evaluation VII on Jameson's Main Codes of Narrative Political Hermeneutics

Zhang Kaiyan (Jia'geng College of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overall history" is the main code of Jameson's political merneneutics, but the ultimate strength of "the overall history" is the mode of production. In Jameson's theoretical model, the mode of production has covered every level, including social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political system production and economical production. We find out that he specially stresses on the basic position of economical production mode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from his lots of works. Therefore his theory is still potentially of economic determinism, but the analysis based on the mode of economic production has unprecedented explanation power. The biggest defect of Jameson's social structure and production theory is that he completely ignored the basic position of racial production mode in social structure. The deficiency of racial production viewpoint leads to his complete blindness for the inner link between racial production and narrative activitie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arrative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narrative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production mode; racial production; Jameson

●作者地址：张开森，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语言应用与叙事文化研究中心；福建 漳州 363105。

Email: kaiyanzhang2000@aliyun.com。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0BZW004)

●责任编辑：何坤翁